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浅论

胡德坤¹, 费泉蕙²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马里兰 巴尔的摩)

[作者简介] 胡德坤(1946-),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费泉蕙(1973-), 女,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硕士生,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是战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建立在抵抗的基础之上的, 其主流是抗战外交。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是中国的抗日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时期, 为战略服务的外交也经历了从避战求和到以战求和、再到以战求援的过程。中国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抵抗, 在国际上树起了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旗帜, 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 为日后获得更多外援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抗战外交; 避战求和; 以战求和; 以战求援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673-09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是战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战时中国外交内容最丰富、最复杂、最具特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主流是抗战外交, 是建立在抵抗基础之上的, 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前提之下来考察中国外交, 得出的结论是: 避战求和、以战求和、以战求援都是抗战外交的形式。

—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时期, 为战略服务的外交也经历了以和备战到以战求和, 再到以战求援的过程。

“七七事变”爆发到平津失陷期间, 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和备战外交。“七七事变”前, 中国国内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 以西安事变为枢纽, 国共两党结束了内战, 携手抗战, 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严重影响了对日备战, 导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仓促应对, 不得不利用外交手段斡旋, 尽可能推迟应战时间, 加紧备战。另一方面, 中国对卢沟桥事件究竟是局部冲突, 还是全面战争的开端一时判断不清。因为自伪满洲国成立以来, 日本以关东军为后盾不断向关内扩张, 多次挑起事端, 大多以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告终。出于以上考虑, 中国对卢沟桥事件之初, 将其视为局部性地方冲突事件, 认为只要日本此次行动仅限于进一步加强其在华北的战略地位, 而不是在华北炮制第二个伪满洲国、危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也可以“作较大之让步”^[1](第409页)。因此, 中国政府决定二十九军“固守勿退”^[2](第32页), 并调兵北上, 加强华北军事实力, 以防不测, 同时, 展开外交攻势, “立谋和平解决”^[3](第247页), 以避免全面战争爆发, 从而确立了以和备战方针。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7月10日,又正式提出书面抗议,指出日军此次行动“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中国军队为避免事态扩大,已极力容忍,希望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要求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恢复事变前的状态^[3](第247-249页)。中国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遭到日本的粗暴拒绝。“七七事变”一爆发,日本法西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4](第424页)。据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近卫首相和日本内阁都认为,这是建立“举国一致”对华战争体制,解决“多年的对华悬案”的良机^[5](第197页)。因此,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决定,于7月10日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6](第366页)。日本政府的声明一是借此进行全面侵华的战争动员,二是借“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掩饰其军事行动,让中国政府心存和平幻想。同时,在对外外交上,力图撇开中央政府,直接与华北地方政府交涉,并反对中国中央军北上,以便以最小的代价占领华北。按照日本政府的方针,7月11日晚,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驻北平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议》,要求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离卢沟桥。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达天津,下令“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5](第178页),表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而《卢沟桥事件现地协议》便成了掩饰日本全面侵华的烟幕弹。

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临近,中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外交活动:一是直接对日交涉,二是请求西方大国调解。对日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力求通过中央级交涉,谋求和平解决。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会晤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时指出,“两国军队之冲突,为国与国间之冲突,决非单纯地方问题”,要求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反对日方绕开中国政府直接与地方当局交涉,遭到日高拒绝。此后,日方不仅一再拒绝中方的正当要求,而且还指责中方反对与地方当局交涉是“毫无和平交涉之诚意”,要求中国“迅速反省”^[3](第252-253页)。7月17日,日本驻华使馆照会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妨碍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并限于7月19日回答^[5](第199页)。7月19日,中国外交部在对日备忘录中再次重申中央交涉的和平解决诚意。7月20日,王宠惠再次约见日高指出,“任何国家之外交,无不由中央政府主持办理。……中国政府固无时无刻不准备与日本政府交涉”,“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3](第273页)。但日高不予理睬。此时,中国政府确实对避战求和还抱有幻想,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一回到南京就指出,之所以“注重于日本撤兵的交涉问题,盖犹豫华北事变,或许还有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7](第12页)。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对日表示诚意,无奈日本完全不领情,导致中日交涉毫无进展。

这一时期中国也对英美德展开了积极的外交。由于中国是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侵华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也必然会加深日本同西方大国的矛盾,因此,中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一矛盾寻求西方大国的支持,调解中日关系。“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虽愿意调解,但要求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不愿单独对日。美国则不愿过早同日本对抗,采取回避政策。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不分是非曲直,竟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通过和平谈判与协商”解决争端^[8](第3页)。这一声明将美国绥靖政策的本质暴露无遗,日本看准了美英的软弱态度,更加有恃无恐地扩大侵华战争。蒋介石预感到形势紧迫,于7月20日匆匆赶回南京,接连会见美英等国大使,强调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迫在眉睫,“日军之意最初不过欲解决华北独立化问题,以后恐将要求解决全部问题”。“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可挽危机”,“迟恐不及”^[3](第350页)。对此,英国立即做出了反应,张伯伦首相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日。但美国坚持不愿采取“完全一致的干预行动”^[9](第212-213页),对此,中国政府深感失望。8月23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写到:“我确实非常失望,美国竟然不与英国合作,来努力防止中日冲突,而这一冲突通过英美合作本来是能够得以转变的。”^[10](P.309)宋美龄更是“十分怨恨”地表示:“美国在中国正从事生死存亡奋斗的道路上,竟过分地放下许多绊脚石。”^[11](第470页)中国政府在谋求美英调解的同时,也在积极动员德国出面调停。

早在1936年,德日两国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共同需要,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了东西方战争策源地。但在中国问题上德日两国存在矛盾,德国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因而在“七七事变”后德国愿意调停中日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在西方大国中,德国是惟一同日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希望德国居间调停,实现中日和解。7月27日,蒋介石接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指出:“此次事件决非局部问题”,如果日本继续扩大战争,中国必将“以全国力量与之宣战”,希望德国“趁此机会对日本进友谊之忠告,……使其态度趋于和缓”^[3](第357页)。陶德曼欣然同意进行斡旋,但遭到日本断然拒绝,无能为力。

日本正是看清了中国避战求和心切,看穿了美英的软弱无能,也洞悉了德国的暧昧立场,因而敢于肆无忌惮地扩大战争。7月25、26日,日本援兵一抵达华北,便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29日攻占北平、天津。同日,日本外相广田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拒绝任何外国的干预,从而宣告了中国政府以和备战外交的终结。

从卢沟桥事件到平津陷落,中国政府开展的以和备战外交,其结果有得有失、有利有弊。从积极面来看,一是透过外交努力多少能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的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二是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是和平受害者的形象,有利于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国际上孤立日本。从消极面来看,一是模糊了各国对中日冲突走向的判断,认为此次冲突会像以往那样只是中日局部冲突的延续,日本占领平津后会止步,而“中国人在表示一番抵抗之后就会接受强者一方的要求而了事”^[12](第312页)。因而,大多数认为不会扩大为全面战争。二是谋和心切使各国对中国的抗战决心和能力产生怀疑,认为中国人抵抗不过是摆摆样子,“没有谁相信中国准备与日本进行战争”^[13](P.92)。其结果是助长了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三是压制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不利于组织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以和备战外交是利弊参半,得失相当。

二

从平津失陷到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后,中国外交进入了以战求和时期。平津失陷表明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避战求和此路不通。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战是和,何去何从,必须迅速作出抉择。于是,围绕着和战问题,执政的国民党内展开激烈的争论。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公然鼓吹亡国论;以孙科为代表的主战派则认为“‘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7月29日,孙科发表对记者的谈话指出,日本的阴谋旨在“分化中国,逐步并吞”,中国“必须以全面抗战答复”日本的侵略行径,方有和平可言。在外交上,弱国更须广泛觅友,“决不能因怕得罪人,而不敢觅取友邦,自陷孤立”,他认为,英美难恃,“中国唯一可找之朋友为苏联”^[14](第51-52页)。面对和战之争,蒋介石于8月7日在庐山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对和战作最后抉择。蒋介石在会上指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中日冲突“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中日冲突必须以全面抗战才能解决。以抵抗求生存,这一点蒋介石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他同时又认为,“英美在道义上、精神上,对我们可以有相当的帮助,物质上我们不能作一定始终靠得住的打算”^[15]。国防会议最终确立了全面抗战,以战图存的方针和持久消耗战略^[16](第273页),但同时又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之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15]。表明中国政府已抛弃避战求和政策,确定了以战求和政策。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正是在以战求和政策指导下进行的。

日本占领平津后,一改过去拒绝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的政策,主动上门要求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涉。8月2日,日本首相近卫召集陆、海、外三相会议,决定任命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为代表与中方谈判。8月6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制定了《日中邦交全面调整纲要》,要求中国今后不再将承认(伪)满洲国作为问题,日中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取消抗日运动等。8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会议商定了《日中停战条件》,主要是:将平津周围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建立亲日政权;解决日中间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等。以上条件,要促使中方提出^[6](第367-369页)。日方虽制定出以上谈判方针和停战条件,但

并非是真的进行谈判,而是摆出谈判的架式,以外交手段达到以下目的:一、用协定巩固已占领的平津地区,使其合法化,再建立亲日政权,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二、施放烟幕弹,以有利于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正如外相广田在 8 月 7 日给川越的电报中所指出的,从日本国内派往中国的 3 个师团预计在 20 日集中完毕,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需要同中国谈判^[5](第 248 页)。可见,日本谈判是假,扩大战争是真。

中日双方出于战略需要,于 8 月初在上海进行秘密接触,日方代表为驻华大使川越茂,中方代表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8 月 7 日,川越抵沪秘密会见了蒋介石,探询与中方谈判的可能性。8 月 9 日,高宗武在上海与川越举行秘密谈判,日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谈判条件,致使中方无法接受。同日,上海发生大山事件,战争的乌云迅速在上海上空聚集。中国政府已预感到上海之战不可避免。驻日大使许世英认为,日本历来“口号与手段,莫不相反”,“所谓不扩大者,盖为对内欺君民,对外欺国际之口号”,“本月中旬以后彼必大举攻我”^[17](第 42 页)。为防止日本突然袭击上海,中国政府紧急增兵布防,加强上海防务。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求和平解决大山事件。在上海,大山事件一发生,上海市长俞鸿钧立即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进行多次会商,建议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但冈本却认为大山事件是“对皇军重大侮辱”,反而要求中国保安队后撤^[1](第 268 页)。在南京,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大使日高也进行了紧急磋商,日方虽表面上同意“就地解决虹桥事件”,但却大举调兵遣将,显然是将谈判作为掩护扩大侵华战争的烟幕弹。中国外交部还向西方各国驻沪使节通报情况,请求列国出面与日交涉。8 月 12 日,由多国代表组成的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就虹桥事件举行会议,日方代表不仅不承认大山事件是日方的挑衅行为,反而诬陷中方“违反停战协定”,致使会议不了了之。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了战火,中国军队展开反击。8 月 14 日,中国政府发布抗战自卫宣言,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将采取“断然措施”^[6](第 370 页)。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迅速投入上海作战。至此,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中日局部战争便发展成为中日全面战争,中国以战求和外交也走到了尽头。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是建立在对日抗战的基础之上的。从平津陷落到淞沪抗战爆发,是中国对日政策由和向战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中国对日外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强硬,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在对日交涉中,有人多次进言蒋介石,劝其对日让步,蒋介石同意对日交涉,但指示“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18](第 413 页)。大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确表示,中国已到了“不是单纯讲理可伸张正义的时期,我们必须有了自卫自存的力量表现,然后才能实现提携共存的希望”^[3](第 296—297 页)。可见,中国对日外交是抗战外交,维护了中国主权与尊严。第二,以战求和外交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以战求和外交虽未达到和的目的,但在世人面前却展现出中国不屈不挠的决心与信心。“七七事变”以来,西方人士“往往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的抵抗无济于事。他们认为日本终究是要占领中国的,那末向中国提供援助又有何用”^[19](第 678 页)。正在欧洲巡访的孔祥熙十分清楚西方国家对华避战政策的不满,他说:“华北事变,中外震惊,近则敌势越张,我气益沮,国际间向表同情于我者,亦将对我失望,至为痛心。”^[20](第 148 页)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要放弃求和备战的方针,确立以战求和方针。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与西方大国均有切身利益关系,日本在上海挑衅,中国若坚决应战,则可起到“正世界视听”、“动列强观感”的效果,树立起中国抗战的形象,以赢得列国的支持;在迎战大同时,通过外交谋和,以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以战求和的外交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到 1937 年底,国际形势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相反,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提高”^[21](第 570 页)。

三

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实施了以战求援外交。

从平津作战到淞沪会战,中国政府的求和希望彻底破灭。中华民族要生存,只有一条路可走:抗战

图存,背水一战。但中国是一个受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弱国,同日本相比,敌强我弱,实力悬殊。因此,中国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外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以战求援便成为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主题。

中国求援的重点无疑是西方大国,其中,美英法等国是中国寄予希望最大的国家。自“七七事变”始,中国政府派出孔祥熙使团访问欧美诸国,寻求实质性援助,经过艰苦的游说,终于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信用贷款、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协议。从协定看,西方大国似乎愿意援助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口是心非。特别是中国抗战全面展开后,亟需国际援助,西方大国均不愿因援助中国而得罪日本,实际是起到了纵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作用。

在分别向西方大国求援无果后,中国将求援重点转向了重要的国际组织,希望西方大国依托国际组织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后,中国政府向国联递交了照会,揭露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行为。9月12日,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顾维钧向国联提交申诉书,要求国联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安排对华贷款和一般财政援助问题。此后,顾维钧多次在国联大会和远东咨询委员会上,慷慨陈词,深刻指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不仅是要征服和统治中国,而且要把欧美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从而打破了远东秩序,“把世界投入一个充满屠杀与毁灭恐怖的混乱局面”。他强烈要求国联“公开谴责这种对国际法、对盟约义务和对正义与原则的公然破坏”,并要求“能够在现实范围之内,尽量给予这个受到公然侵略的中国以最大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22]。尽管国联多数成员国对中国的处境表示同情,但英法控制下的国联却依然袒护日本,甚至不敢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尽管如此,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提议国联给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各成员国给中国以援助,也算是对中国的一点安慰。

英法深知,解决远东问题离不开美国,但美国又未加入国联,为了将美国推上远东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他们极力推动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中国在对国联失望之后,又将求援外交重点转向九国公约国会议。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中、美、英、法、苏等十九国代表与会。果然,会议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英法美三国代表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主角。11月1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恳请各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给中国以援助。对中国的正当要求,只有苏联代表明确表示支持,英法美三国代表则担心支持中国会刺激日本,均采取回避态度,对中国的呼吁不予理睬,致使会议在空泛清议后便草草收场。正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1937年10月9日的日记中所预料的那样:“九国会议又能取得什么成果?强迫交战双方议和,然后被断然拒绝?试行经济制裁吗,然后得到象阿比西尼亚问题时那样的可耻失败?或者是仅满足于道义谴责,打一场大雷,而效果只等于在日本下一场小冰雹?”^[23](第224页)尽管中国政府事先已预料到会议的结果,但仍对布鲁塞尔会议大失所望,正如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云,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本应采取的”^[19](第696页)。

向苏联求援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又一重要方面。自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实施反苏反共政策,恶化了中苏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西方大国都不敢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欲诉无门时,只有苏联出于国际正义和自身安全,捐弃前嫌,旗帜鲜明地谴责日本侵略,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改善,促成了中苏复交。“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进攻迫在眉睫,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仍旧态度暧昧,而苏联则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这种形势促使中国政府将外援希望寄托于苏联身上,从而更加重视中苏关系。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中国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战胜日本,必须借助苏联,如果苏联能陈重兵于远东,则会对日本侵华起到牵制与威慑作用;如果苏联能参加对日作战,则“将赢得对日作战的彻底胜利”^[24](第9页)。“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2天,即7月8日,蒋介石紧急召见孙科、王宠惠,指出,“卢事若立即扩大,则非全面抗战不可”,而要支撑一场全面战争,关键的因素是“苏联的军械供应及互助协定等问题”^[25](第16页)。他当即派孙科和王宠惠到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要求两国签订互助协议。鲍氏则认为,在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之际,签订此类条约“无异自招日本的进攻”,因此,苏联只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孙科强调指出,两国

若签订互助条约,“当可阻止敌人再度深入”^[25](第 17 页)。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苏联也不例外。苏联也不愿冒着直接同日本冲突的危险,同中国订立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是限定在不同日本发生冲突的框架之内的。基于这种考虑,苏联只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请求,苏联终是寸步不让,中苏交涉陷于停顿。淞沪会战打响后,军火供应成为当务之急,而西方大国却作壁上观,万般无奈的中国政府加快了向苏联求援的步伐。为了打破僵局,中国提出先从商务入手单独解决苏联对华军火供应问题,又遭苏联拒绝。苏联坚持“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首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26](第 72 页)。但同时又表示,即使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会援助中国。苏联的积极态度,使中国政府转向现实主义态度,重新审视对苏外交目标,因为“在三十年代,互不侵犯意味着积极的外交关系。它意味着除了直接战争外积极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24](第 153 页)。即使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也是十分有利的。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同意接受苏联的提议。8 月 21 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也就能迅速地从苏联获得巨额贷款用以购置苏联的军火物资。据统计,苏联先后三次对华贷款总数达 2.5 亿美元之多,大量军火物资从苏联源源运到中国战场,这对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无异于雪中送炭。

从总体上看,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成功的外交,其一,求援外交是以坚决抵抗为前提、为后盾的,在国际上树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旗帜,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二,向西方求援虽未成功,但广泛宣传了中国抗战的意义,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其三,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能从苏联获得实质性的援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大灭了日本的威风。同时,还增加了中国对西方大国外交的筹码。

四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时期,日本在远东的侵略与德、意在欧、非的扩张相呼应,使局部战争升级,将人类逼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前夜。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表明,法西斯的侵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威胁,制止法西斯的侵略也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中国外交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其经验与教训值得研究与总结。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同“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国外交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基点不同。“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实施了不抵抗主义,中国外交是建立在不抵抗基点上的,只能妥协退让、失地求和,结果被侵略者所欺,被西方大国所弃,使同情者失望,使国人愤慨,导致外交活动处处碰壁,无所作为。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则是建立在坚决抵抗基点上的,以战求和,以战求援,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使苏联鼎力相助,使国人振奋,使侵略者胆寒,外交成就斐然。其二,方针不同。“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外交方针是依赖国联,依赖西方大国,当西方大国和国联对日本侵华实行绥靖政策、袒护日本时,中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外交毫无成就。“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方针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家支持,当西方大国不愿因援助中国而得罪日本时,中国却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这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其三,性质不同。“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是求和外交,其本质是妥协外交,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国民党政权,不惜出卖东北三省领土来换取同日本的和平,这种外交就是投降外交。“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外交虽然也有求和目的,但其本质是抗战外交,求和是以维护领土和主权不受损害为前提的,主要是作为抗战总战略中的一种策略手段使用的,所以,不为日本恐吓要挟所动。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中国外交的重心必然会从求和转向求援。淞沪会战打响后,蒋介石不惜进行“一生中最大、最有争议的赌博”——奋起抗战^[21](第 602 页),中国外交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外交。由此观之,“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为抗战服

务,是抗战外交。

同“九一八事变”时相比,“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成功的外交,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九一八事变”始,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东三省,对蒋介石来说,未动摇其统治根本。蒋介石认为,奉系军阀控制下的东北处于半独立状态,名义上服从南京中央政府领导,实际上是自行其是。因此,日本占领东三省尚未威胁到蒋介石的有效统治,致使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外交上妥协退让。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表明日本是要吞并全中国,这就从根本上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继续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其统治会被日本推翻,另一方面也会被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垮,权衡利弊,为了蒋家王朝的统治,蒋介石只能走抗战之路,外交上对日本实行强硬方针。第二,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九一八事变”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蒋介石集团为国民党一党私利,不顾民族利益,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剿共”作为首要目标,对日本侵略却步步退让。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国民党内抗战派的不满,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这种形势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七七事变”后迅速确立抗战方针和抗战外交的基础。第三,一定程度的备战是实施抗战外交的后盾。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长期军阀混战,后又经历十年内战,国防建设近乎乌有。“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客观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抗战的军事准备。蒋介石在为不抵抗政策辩解时宣称,中国“枪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27](第30页)。蒋介石以“一切不如日本”来推卸不抵抗主义的罪责是不行的,但多年无国防建设对蒋介石的决策也是有影响的。“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使国民政府开始将国防建设提上了日程。1937年4月,军政部部长陈诚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民国25(1936)年一年的(国防)建设成就超过了民国21(1932)年至24(1935)年间的(国防)建设工作,而这四年的(国防)建设成果又相当于民国以来二十年的总和”^[16](第345页)。这表明“七七事变”前,中国的国防建设已有一定的成效,为蒋介石确立抗战方针和抗战外交提供了军事后盾。第四,放弃对西方大国的幻想,广寻盟友于世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将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大国,西方大国虽对日本独霸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支持中国而得罪日本,均对日实行绥靖政策,使中国大失所望。“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西方大国故伎重演,依然绥靖日本,中国吸取了“九一八事变”后依赖西方大国外交失败的沉痛教训,不再对西方大国抱有幻想,而是在立足于抵抗的基础上广泛寻求国际支持,一方面获得了苏联的宝贵援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宣传中国奋起抵抗的不屈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同情。中国始终相信,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本国的领土与主权,也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利益而战,西方大国也迟早要站在中国一边,这种判断也是中国毅然实施抗战外交的重要因素。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中国抗战外交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传统观念,开创了弱国成功外交的先例。的确,国弱言轻,自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国际上只能任凭列强摆布,真正是“弱国无外交”。“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升,使贫弱的中国敢于抵抗东方霸主日本的侵略,这是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成功的抗战外交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没有过的事情。这一成功的外交经验不仅为新中国所继承和发扬,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其次,一国外交不能建立在依赖他国的基础上。国际关系是讲究利益和利害关系的,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的最高准则。应该说中国抗战与西方大国利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西方大国理应坚决支持中国,但西方大国谁也不愿因支持中国而过早地同日本对抗,致使对西方大国的外交不能奏效。苏联能慷慨解囊援助中国,首先是为了利用中国挡住日本这股祸水,以解远东之忧,使中国外交易于达到目的。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本国独立抗战的基础上的,所以,当西方大国依然绥靖日本时,中国外交未重蹈“九一八事变”后外交的覆辙。再次,

一国外交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外交上无所作为,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为“以夷制夷”外交。这种外交从利用列强的矛盾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往往也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如果将希望寄托于以夷制夷外交,则难以完成外交使命。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来看,尽管日本侵华严重损害了西方大国的利益,西方大国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对中国深表同情,但远未达到援华制日的程度,因而,没有一个国家旗帜鲜明地援助中国。正是因为“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是将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使用的,才不致失望、被动。最后,避免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影响外交。自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苏联诞生后,国际关系中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而经常出现新的矛盾和对抗,使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出于反苏反共的本性,蒋介石南京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对苏联采取敌视政策,中苏关系十分低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将遏制日本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大国,其结果则是大失所望,反而是社会主义苏联坚决站在中国一边,谴责日本的侵略。“七七事变”爆发后,当西方大国依然绥靖日本时,又是苏联毅然站在中国一边,全力援助中国。事实教育了蒋介石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蒋介石政府终于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障碍,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受了苏联的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美英等西方大国同苏联捐弃前嫌,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对敌,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对战后国际关系中如何正确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可见,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完成了由以和备战向以战求和,再向以战求援的重大转变,其中不乏失误和曲折,但从整体考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抗战外交,它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功不可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这段外交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对于今天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开展独立外交,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国外交关系[A].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Z]. 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
- [2] 秦孝仪. 作战经过:二[A].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 [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卢沟桥事变史料:上[Z]. 革命文献,第106辑.
- [4] [日]现代史资料:12[A]. 日中战争:4[Z]. 东京:美铃书房,1993.
- [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战史丛书:86[A].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Z]. 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
- [6] 日本外务省. 文书[A].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Z]. 东京:原书房,1976.
- [7] 张其钧. 中华民国史纲:四[M]. 台北:1957.
- [8] 李巨廉,王斯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献资料集(1937.7—1939.8)[Z].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9] [美]罗伯特·达莱克.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0] BORG, Dor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1] 鲍家麟. 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1937—1939),对日抗战:上[A]. 中国近现代论集:第26编[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2] [英]华尔脱斯. 国际联盟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13] IRVING S. Fri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M]. New York: The Haddon Craftsmen. Tnc, 1940.
- [14]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1辑[Z]. 华美晚报,1937.
- [15]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J]. 民国档案,1996,(1).
- [16]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M]. 台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 [17]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第11辑[Z]. 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 [18]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世杰日记[Z].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军事:二[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22] 董霖.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M].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 [23] [美] 约瑟夫·C·格鲁. 使日十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24] [美] 高沃龙. 对手与盟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 [25] 孙科. 中苏关系[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6] 陶文钊,等.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27] 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桂 莉)

Study on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from the July 7th Incident to the Battle of Shanghai

HU De-kun¹, FEI Quan-hui²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U.S.A)

Biographies: HU De-kun (1946-),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I Quan-hui (1973-), female, Graduate, Hopkins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to China's wartim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July 7th Incident to the Battle of Shanghai. The diplomacy in this period is a major aspect of China's wartime foreign policy. Its fundament is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its main stream is diplomacy of resistance. From the July 7th Incident to the Battle of Shanghai, it is the period of the preparation,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ing of China's strateg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diplomacy which serves this strategy undergoes three terms, from avoiding war for peace to resisting for peace and then resisting for assistance; China holds up the flag of against the aggression of Fascist over the world by its heroically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 China explores the first war field against Fascist in the worl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been on the rise. The affe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widely broadcasted and China gains the foundation for more foreign assistance.

Key words: diplomacy of resistance; avoiding war for peace; resisting for assistance; resisting for peace